

中国哲学的 特质

牟宗三 著
罗义俊 编

中国哲学用一句最具概括性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哲学特重“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西方哲学则相反，不注重主体性，而重客体性。它大体是以“知识”为中心而展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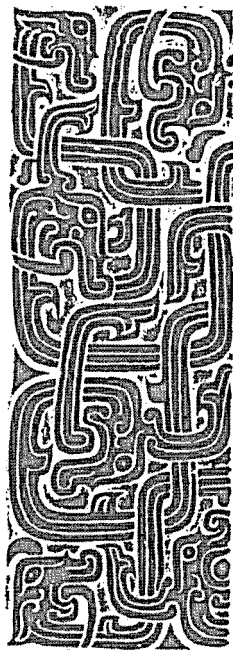
中国哲学以“生命”为中心。儒释道三教是讲中国哲学所必须首先注意与了解的，二千多年来的发展，中国文化生命的最高层心灵，都是集中在这里表现。对于这方面没有兴趣，便不必讲中国哲学。对于以“生命”为中心的学问没有相应的心灵，当然亦不会了解中国哲学。

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在中国哲学里选择合乎西方哲学的题材与问题，那将是很失望的，亦是莫大的愚蠢与最大的不敬。

(牟
(宗
(三
(学
(术
(论
(著
(集

中国哲学的特质

牟宗三 著
罗义俊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哲学的特质/牟宗三著. 罗义俊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7
(牟宗三学术论著集)
ISBN 978-7-5325-4698-5

I. 中… II. ①牟…②罗… III. 哲学—研究—
中国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4995 号

本书由台湾学生书局授权出版

责任编辑 罗 颢
装帧设计 红 斌
顾 顾

牟宗三学术论著集

中国哲学的特质

牟宗三 著

罗义俊 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875 插页 3 字数 160,000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ISBN 978-7-5325-4698-5

B·605 定价: 18.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出版前言

牟宗三先生(1909—1995),字离中,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1909年6月12日(宣统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生于山东栖霞牟家疃。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先后任教于山东寿张县乡村师范、广州学海书院、山东邹平村治学院、广西梧州中学、南宁中学、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并主编《再生》、创办《历史与文化》、编辑《理想历史文化》杂志;1949年后,历任台湾师范大学、东海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新亚研究所哲学组导师,受聘讲学于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台湾师大国文研究所、中兴大学等校,后任东海大学、中国文化大学、中央大学荣誉讲座教授,讲授逻辑、知识论、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与文化。1995年4月12日,逝于台北。

牟宗三先生以“反省中国文化生命,以重开中国哲学之途径”为一生职志。初从张申府先生习罗素、维特根斯坦、怀特海哲学,后长期追随当代新儒学开山熊十力先生,与唐君毅、徐复观同为熊氏在港台的三大弟子。熊氏曾说:“宗三出自北大,北大自有哲系以来,唯此一人可为可造。”牟先生一生讲学不倦,著述不已,传世的著述译作三十种。其中有:哲学讲座《中国哲学的特质》(1963年6月初版,以下仅注明初版年月,省“初版”二字)、《中国哲学十九讲》(1983年10月)、《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1990年3月),以及牟先生去世后刊行的《人文讲习录》(1996年2月)(还有尚未刊行的《四因说演讲录》),由此可统窥牟先生学问的范围、大纲节

2·牟宗三学术论著集·中国哲学的特质

目、脉络指向、文化意愿及精神意态。《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涵义》(1935年5月)、《历史哲学》(1955年夏)、《名家与荀子》(1979年3月)、《才性与玄理》(1963年9月)、《佛性与般若》(1977年6月)、《心体与性体》(三大册,1968年5月、10月,1969年6月)、《从陆象山到刘蕺山》(1979年8月),为一整套的中国哲学史论。其中《历史哲学》又与《道德的理想主义》(1959年11月)、《政道与治道》(1961年2月)并称为三新外王学(历史社会政治哲学)名著。译注康德哲学的三大批判:《康德的道德哲学》(1982年9月)、《康德纯理性之批判》(上下册,1983年3月、7月)、《康德判断力之批判》(上下册,1992年10月、1993年2月)。《逻辑典范》(1941年9月)、《理则学》(1955年11月)、《认识心之批判》(1956年9月),以及译注维特根斯坦《名理论》(1987年8月),乃为其逻辑学、认识论著作。《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1974年3月)、《现象与物自身》(1974年8月)、《圆善论》(1985年8月),则表示牟学思想体系的完成。此外还有《生命的学问》(1970年9月)、《五十自述》(1989年1月)、《时代与感受》(1984年3月)等。

牟宗三哲学是中国传统儒学乃至中国哲学在当代的发展,“第三期儒学”的概念即首先由牟先生所提出。牟先生是当代新儒学主要的、影响卓著的代表人物。他的先后期门生弟子大多是港、台地区哲学界、新生代的杰出学者,影响遍及北美、英、欧陆、日、韩、新、澳洲等地。《中国哲学的特质》和《中国哲学十九讲》七八十年代已有韩文版行世;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Joël Thoraval 博士现正拟将前书译成法文印行。1987年香港大学特颁牟先生荣誉文学博士仪式上,哲学系教授 F. C. Moore 博士特致辞说牟先生由儒家的心性学为起点所建立的“道德形上学”,为一超越义的形上学系统提供一道德的证明,是一勇

敢而有原创性的思想线索,有深远的成果。同年冬季学期起,德国波昂大学专设“牟宗三哲学”课程,由哲学系教授 J. Simon 博士与汉学系教授 R. Traunzettel 博士共同主讲。《简明大英百科全书》也设“牟宗三”条目。牟先生生前名字又进入 1995 年出版的《英文剑桥哲学字典》索引,其中“中国哲学”的总条目中指出“牟先生是当代新儒一派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

为满足学术界的需求,提供一种学术资料,经上海社科院罗义俊先生积极联系推荐,征得牟宗三先生夫人赵惠元女士及牟公子元一先生追认同意并全权授权,由本社印行牟先生部分著作的简体字本,并同意个别地方稍作技术性处理。此外,由印刷故,原书个别的错讹字,径改而不标明标校之符号;《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则依牟先生生前所作的标校,亦径改。本社现在的印行次第,并没有遵循牟先生著作原来发刊的时序,是经过相应策划后的编排。书末附录所收的牟先生相关的八篇文章及总标题,特为这次出版而约请罗义俊先生编纂而定。牟先生诸如相关的文字还有很多,惟因缘不具,未能与读者共享。至于由罗义俊研究员撰写的读书笔记,作为一家之言,仅供读者参考。

《中国哲学的特质》再版自序

此小册便于初学,但因是简述,又因顺记录文略加修改而成,故不能期其严格与精密。倘有不尽、不谛或疏阔处,尤其关于《论》、《孟》与《中庸》、《易传》之关系处倘有此病,则请以《心体与性体》之《综论》部为准,以求谛当,勿以此而生误解也。

此讲辞以儒家为主,盖以其为主流故也。若通过《才性与玄理》、《心体与性体》、《佛性与般若》,再加以综括之简述,则当更能尽《中国哲学之特质》一题名之实,而凡所述者亦当更能较精当而切要。惟如此之简述,内容虽可较丰富,然与西方哲学相对较以显特质,即使不加上道家与佛教,亦无本质的影响也。故此小册题名曰《中国哲学之特质》,纵使内容只限于儒家,亦无过。

牟宗三 序于香港

一九七四年八月

小 序

本讲演是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所规定的题目。约定十二次讲完,每次一小时。在这十二次里,想把中国哲学的特质介绍给社会上公余之暇的好学之士,当然是不很容易的。如果是轻松地泛泛地讲述,那当然比较具体一点,听起来也比较有兴趣。但这样恐怕不会有真正的了解,也不是这个倒塌的时代讲中国学问之所宜。因此,我采取了直接就中国学问本身来讲述的办法。这也许听起来比较艰难一点,但若因此而稍能把握一点中国学问之内在的本质,或即不能把握,而在艰难之感中,引起对于中国学问之正视与敬意,这也并非无益处。

中国哲学包含很广。大体说来,是以儒释道三教为中心。但我这里是以中国土生的主流——儒家思想,为讲述的对象,其余皆无暇涉及。

本讲演并无底稿。在讲述时,托王煜同学笔录。口讲与自己撰文不同,而笔录与讲述之间亦不能说无距离。如果我自己正式撰文,也许比较严整而详尽。但有这个时间限制的机会,也可以逼迫我作一个疏略而扼要的陈述,这也自有其好处。而王君的记录也自有其笔致。换一枝笔来表达,也自有其新鲜处。顺其笔致而加以修改,也觉得与我的原意并不太差。紧严有紧严的好处,疏朗有疏朗的好处,是在读者藉此深造而自得之。

儒学与儒教

——读牟宗三先生《中国哲学的特质》

罗义俊

一、中国哲学的入门读本

终其一生,在当代新儒家中,牟宗三先生讲学热情特高,讲学不倦。五十年代去台不久,在台湾师范学院(今台湾师范大学),于课外发起人文友会,另在自己寓所或教室,聚徒讲习;宋明书院讲学流风遗韵所及,其时学子今多各有建树焉。至耄耋之年,犹骥足未停。九十年代,在港自旧式无电梯的四楼家居到旧式无电梯的四楼新亚研究所,每日“拾级”上下八层一次;驻台后,直到去世前几个月,还常从永和县赶到台北市中国哲学研究中心视讲。其中,有散讲,也有系列的哲学讲座。《中国哲学的特质》是其中印行的第一本系列的哲学讲座集(人文友会期间的《人文讲习录》既是系列讲座,又是师弟子问答录,出版于牟先生去世的1996年2月)。

1960年10月,牟先生离台中东海大学,任教港大,讲授中国

哲学。1962年8月,与唐君毅等先生发起、并联络张君勱、徐复观等先生,成立东方人文学会,发扬自由讲学精神。《中国哲学的特质》乃1962年在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对社会公众的演讲辞,以儒学为讲述对象,分十二讲。最后一讲《作为宗教的儒教》,原为在台南神学院的讲辞,尝刊于王道创办的香港《人生》杂志1960年第5期,移此作第十二讲。讲辞乃由随牟先生攻读学位的、现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高级讲师王煜博士笔录,牟先生顺其笔致,加以修改而成现貌。次年即作为东方人文学会的丛书,由人生出版社印行。

本书以儒家思想为讲述对象,而略及释道,但这不能误解为牟先生、新儒家讲中国哲学只讲儒家思想。至于为什么本书以儒家思想为讲述对象,牟先生在《小序》中有明确的交代:“中国哲学包含很广。大体说来,是以儒释道为中心。但我这里是以中国土生的主流——儒家思想,为讲述的对象。其余皆无暇涉及。”我们这个时代的学风是有点令人惊诧莫名的,你讲老庄、讲刑名、讲墨、讲耶、讲各家,均可作价值肯定而无妨,惟独真要讲儒家就易招致非议(它形成批孔反儒的知识社会,这也正是“文化大革命”得以掀起批孔反儒的社会基础),只讲儒家思想云云即是其中的一个指责与暗示。牟先生这个郑重其事的交代,即可指证此类指责与暗示是没有根据的。读者,尤其是大陆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切勿跳过此《小序》。

当其时,牟先生正在撰巨著《心体与性体》。《心体与性体》体大思精,严整、缜密、详尽,《中国哲学的特质》疏略,自不能与之相比。牟先生自谓因其简述与顺记录而成,故不能期其严格与精密。倘有不详不谛或疏阔处,尤其关于《论语》、《孟子》与《中庸》、《易传》的关系倘有此病,则以《心体与性体》的第一部《综论》为准。(见《再版自序》)但就书而论,本书虽“疏”却“朗”,

“简”而有统,概念明确、理路清晰、擅于分析、各种分际处从不含混淆过,不失牟宗三哲学特色,确便于初学。所以它可说是中国哲学的入门读本。

二、“学”与“教”:中国哲学、儒学的双重性

通过步步推进、步步分明的简要讲述,以及相应的中西比较,本书抉发与展示了中国哲学、儒学作为生命的学问而特重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的理路、本体与工夫融一的理路,从而也就豁显了中国哲学的特质。由此,自不难从体性上看到,也可说大体上回答了中国哲学、儒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别在:西方是以知识为中心的展开,哲学自哲学,宗教自宗教;而中国,则既有“学”的一面,又有“教”的一面。作为“学”的一面,本书涉及对象儒释道三家都是以生命为中心而展开的学问,是活动于“生命”的理智及观念的反省说明系统;作为“教”的一面,儒释道都以高度的人生智慧,给人类决定了一个终极的人生方向,而且将永远决定着,取得了耶稣在西方世界中的地位之地位,是儒教,是佛教,是道教,其中本书讲述对象儒教是道德教、成德之教、人文教。“学”、“教”两面,并行不悖,共存一体,“成圣成佛的实践与成圣成佛的学问是合一的”。依《心体与性体·综论》所说明宋明儒的话,即“亦道德亦宗教,即道德即宗教,道德宗教通而为一”;“其真实意义则在于个人有限之生命取得一无限而圆满之意义。此则即道德即宗教,而为人类建立一道德的宗教”。

“学”与“教”,是本书所展示的中国哲学、儒学的双重性。而中国哲学、儒学之特重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及本体与工夫融一,则是双重性的义理根据,盖依本书之诠释,吾人生命正可由此而

遥契无限奥秘的天道天命。发显儒学此“学”与“教”的双重性，以重建道德的宗教、人文教，不仅是本书所展示出来的，而且是牟先生一生的诠释方向和哲学宗旨。对当代新儒学，学界昔有谓其忽视宗教精神之批评。最近，有台港个别学人，更执牟先生透过康德哲学以厘清与发显知性一面，而批评牟先生的“道德的形上学”拉掉了儒学天道形上学的神性、宗教性一面。这类批评，显然没有事实根据，仅本书之所展示，即为这类批评，提供了一最好否证。

三、在时代召唤中破障立本

读者可以看到，作为哲学讲演的《中国哲学的特质》，在实际处理中是非常专业的。这也是牟先生哲学著作的一大特点。但也如同牟先生其他著作一样，即使是非常哲学专业的，与现实的时代，也仍然存在着一种关联。此即与时代始终保持着一种逆向观照、反思批评的关系，一种针对性的关系，而不是以顺为正，顺着时代的向下向外的习气滚转。这种关系，即牟先生常说的，我们是针对时代的堕落而讲话。这种关系是真正的批判理性之表现。它贯穿与体现于牟先生的全部学问，本书自不例外。本书及其所展示，在牟先生，乃对他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回应，是针对这个反中国哲学与宗教的时代的讲话。

本书《小序》与第一讲《引论：中国有没有哲学？》，明确表示出了这个针对性。为什么要针对这个时代讲话？因为这个时代，依《小序》所言，是个倒塌的时代。所谓倒塌云云，由第一讲，即可知，乃指中国人自有的价值世界的倒塌，一切皆以西方为标准；此也是牟先生常指称之为堕落的末世之意涵。风起于青萍之末。虽

然,这个倒塌其初起于清道、咸以降西方强势文化从四面八方的侵入,但最终促成的却是民国以来的知识分子。

民国以前,士大夫的上层如曾国藩、张之洞,即便是后来的康、梁,虽然智慧不足以守持中国文化的价值世界,但毕竟在师夷之长技的同时,还知道要守住点什么,而不甘让中国人的身心全部被西方文化席卷而去。民国以后,向西方学习转化为全盘西化的鼓动。这里,不是一个口号、文句的考据问题,而是一已经表现出来的思潮。这个思潮的内在意涵,也就是牟先生所指出的,人们一切皆以西方为标准。而且,这个追求西方思潮所催动的价值取向,已积成民国以后一代又一代的社会氛围,与一般人的心理习气及思维定势,也就是积成了社会无意识层,此终牟先生一生犹未获得社会性的价值扭转。鼓动起这个价值西化思潮,领时代风骚的上层知识分子当然不能卸其责。全盘西化的思潮,不过表明“一切以西方为标准”乃民国以后一统天下的主流社会价值意识罢了。

此时风士习,对于生活在这个时代并亲身领略过的人来说,只是一现代社会思想史的事实。

牟先生抓住这个时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价值特征,指出中国的一般知识分子无不如此,所以有全盘西化之说,其实只是就事实讲话。对事实,只能正视,而不应否认,这是知性的基本要求。

在这样一个唯西方马首是瞻的社会价值意识下,西方的基督教与哲学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中国的儒释道与哲学自然根本没有地位。说中国既没有宗教,又没有哲学,是这个时代“全盘西化之说”的主流价值意识的两大表现,也是这个时代价值标准倒塌的集中表现,也可以说,这个时代正是通过贬损与否定中国的宗教与哲学,推倒了中国人自有的价值世界。这是中国现代社会思想史的一个严酷的事实。

否认中国的宗教与哲学,并不能说明中国没有宗教与哲学,或儒释道三家根本没有地位,恰恰是标明现代中国没有宗教与哲学。然而,民国以后,并不乏讲中国哲学的。如此说来,牟先生所言,似乎并非是现代中国思想史的基本事实。非也。对此,牟先生自有他的分判。按牟先生之见,五四前后,即使是讲中国思想的,骨子里只是奉西方哲学为圭臬,以之定取舍。如大谈墨辩者,其实只是以为中国学术思想中只有墨子较接近美国的实验主义,以求附会。至于名噪一时的冯友兰氏《中国哲学史》,虽并非毫无价值,但冯氏以新实在论的思想为成见,对于宋明儒者的问题根本不能入,对佛学尤其外行,又以西方哲学的分期方式套在中国哲学上,其言十九与中国传统学术不相应。这就是说,他们所讲,只是“西方哲学在中国”,而不是“中国的哲学”。所谓现代中国没有宗教与哲学,也就是没有“中国(传统)的宗教与哲学”。

宗教与哲学,对一个民族来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于此,牟先生说甚多。本书中所讲,有二要点:1. 宗教与哲学是构成一个文化的基本成分。“任何一个文化体系,都有它的哲学。否则,它便不成其为文化体系。”2. 宗教是一民族文化的内在心灵与基本动力。说:一个文化不能没有它的最基本的内在心灵,这是创造文化的动力,也是使文化有独特性的所在。这动力即是宗教。又,在《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中认为哲学是文化的核心,是指导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与智慧,即慧命所在。另在《人文讲习录》和《生命的学问》也各有专论,以阐扬儒家思想的宗教性,并结合建立人文教而言宗教对民族文化的根本意义。认为道德宗教为一民族立国之本,宗教是国脉所在(《生命的学问》、《人文讲习录》)。落到具体的东西方文化来说,即西方文化的动力在基督教,中国文化的动力在儒教,而儒释道三教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智慧积累而得的大本原、大传统。按此,则讲“中国的宗教与哲学”,就是要重立

国本,是中国文化慧命在现代的连续。而西方哲学固然可以被摄化而丰富中国的文化体系,但如果只是“西方哲学在中国”,所建立的自只是西方哲学,那就当然不是中国文化的慧命,又遑论文化慧命的连续?至于否认中国宗教与哲学的根本地位,非但与事实不合,更无疑是斩断了中国文化慧命的连续性,自弃国本,自毁国脉。难怪牟先生要斥之为霸道无知、糟蹋自己、不自爱重、自甘卑贱,是中国之败类。在此自甘卑贱、自我糟蹋下,中国哲学、宗教的存在或存在意义发生了存亡断续的危机。

重建中国的宗教与哲学,是关系到“国本”、“国脉”兴灭继绝的大问题。这是时代的召唤。“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一切皆以西方为标准的时代价值意识,自是重建中国的哲学与宗教的障蔽。现代中国反宗教,尤集中在反儒家之为教。因此,重建中国的宗教与哲学,其主要任务,也即是重建儒学与儒教。《中国哲学的特质》发显儒家思想的哲学与宗教意义,重建儒学与儒教,挺显道德主体,上通天道神性。这就是破障立本,为这个被牟先生判认是价值标准倒塌的时代,开辟一使人向上而不下陷的“价值之源”。

四、性命天道相贯通

尽管牟先生之讲中国哲学针对着民国以后的时风士习,这是牟宗三哲学的文化品格、存在性格之表现。但他不是凭空的针对,或仅仅是从任何民族文化都有其哲学上来说中国哲学,这样说虽不错,但终显笼统,且仅如此说很容易陷入一简单化的民族主义立场而招来后现代派、全球主义的指责。牟先生之展示,也不是一个人无根据的主张。牟先生之发显儒家思想的双重意义,是就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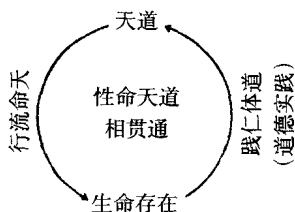
哲学、儒学的实际作客观的了解与相应的诠释,即有独立的知性支持和严整的工作基础,就此也可说是一古典的真正的学院风格。此一诠释风格,置于中西比照格局中看,即不是套在西方标准下选题材,而是有一个中国哲学的文献途径。此文献途径,在牟先生《心体与性体》及《佛性与般若》、《才性与玄理》诸书中常表现为古典的学案方式;本书犹可见其余韵,《小序》中所言本书不是“轻松地泛泛地讲”,本书讲演风格不同于《中国哲学十九讲》、《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此当亦其中之一缘故。牟先生是在独立的知性支持和严谨的哲学工作之基础上,讨论生命与德性、文化与宗教等重大问题的,也就是说,是遵循中国哲学的文献途径,来对中国人内在的心灵走向作理性反省与理智说明的。

按牟先生的反省、说明,中国人的内在心灵走向,自始即与西方不同。它不是一味地向外走,而是内转,让生命回到自身上来正视;也不是在如耶教信仰中的上帝面前止步不前,永成天人之隔,而是往万物感通,向天道神性契通。表现这个内在心灵的是儒释道,惟儒所正视的,是道德人格的生命,使生命“行之乎仁义之途”,亦即以仁义使生命理性化的内在根性。这也就是牟先生所说的:“中国思想的三大主流,即儒释道三教,都重主体性,然而只有儒家思想这主流中的主流,把主体性复加以特殊的规定,而成为‘内在道德性’,即成为道德的主体性。”所以牟先生概括,儒释道都是生命的学问,而特重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是中国哲学自有的形态与特质。

重主体性乃道德宗教的义理所在。牟先生说,不至主体主义,严格讲,并不真能接触道德宗教的真理。牟先生此所谓主体主义,乃从自己的生命主体上立言,把天道神性收进来成为自己的“天命之性”而向外通,并不能理解为执着于知识态度上的主客对立与自我封限的天人隔阂。儒家思想特重道德主体性,其本质意义,

即在开启正视生命的自我觉悟,其所展现出来的道德实践,即是不断地直往外通万物上通天道。这个心路指向与生命境界,自然是主客融会、天人合一的,亦即本书所诠释的天人合德:个人生命应与宇宙生命取得本质上的融合无间。

按本书的抉发与诠释,中国古代圣哲提供了一系列义理,开启了这个心路指向与生命境界及其实现的可能。据笔者心得,其中最基本的,是三大纲维:1. 天道既超越又内在,既存有又流行(活动);2. 性命天道相贯通;3. 践仁体道的道德实践。这三大观念,以性命天道相贯通为枢纽,成一圆教形态,如图:



箭头表示下贯上通。如此,成一道德的形上学。而性命天道相贯通之所以为其中之枢纽观念,盖以主体来观,天道的内在性,天道之由吾人生命之彰显与印证,道德实践之上通天道神性之宗教境界,均由此一观念,而始可畅通无阻,法轮常转。牟先生尝指出,对此性命天道相贯通之意识,若不能正视,则道德实践即不能了切而澈(《心体与性体》第1册)。

因此,性命天道相贯通也是中国哲学的中心观念,是了解儒家思想具有哲学与宗教双重意义的枢纽观念。牟先生说,性与天道为圣人立教、开辟精神生活最基本的观念,后来宋明儒即环绕此中心而展开其义理。在《心体与性体》中,也有专门一章,将此观念作为宋明儒的共同意识,加以论究,兹不赘引。由本书,则已可知,中国哲学与儒家思想何以特重主体性与道德的主体性,何以以生